

王启勋：血洒南疆的易门县长

□林新忠 李渲



王启勋的二儿子王焕卿在讲述父亲的故事。王启勋牺牲后，由于相隔千里，交通不便，家里人虽想去云南看一下他的安葬地，却一直没有成行。直到2000年，王启勋的小儿子王焕梓才带着妻子和孩子去了云南易门，并在父亲的墓旁抓了几把泥土带回栖霞。2007年母亲去世，王焕梓把这几把泥土放在了母亲的骨灰盒上边，也算是让父亲回到了母亲的身边……

去，在进军解放西南、开辟边疆的斗争中再立战功。

在南京，经过几个月简单的培训后，王启勋被分到云南支队第一大队直属队担任行政股长。1949年10月3日，他从南京出发，途经江苏、安徽、河南、湖北、湖南、贵州等省，于1950年3月7日抵达云南玉溪地区，历时五个月，行程3500多公里，其中徒步行军1500多公里。

关于这一段经历，当时任云南支队一大队二中队二班学习班长兼民运委员的黄志昌在他撰写的《记解放初期易门县长王启勋烈士事迹》中有详细的介绍。

黄志昌回忆说，他那吃大苦耐大劳的“老黄牛”精神深深地感染着我，吸引着我。大队行政股担负着为全大队300多人打前站、解决食宿和行军中的整个运输、收容工作的重要任务，困难不少，但他迎着困难上。在进军途中，服务团均按野战军的要求进行准备，每天行军少则50里，多则100里。白天顶风冒雨，夜间站岗放哨，又要严防敌特袭击，困难可想而知。作为行政股长，王启勋，为保证行军顺利、安全到达目的地，总是提前行动打前站，安排好宿营地。

部队从湖南湘潭开始徒步急行军起，王启勋就勇挑重担，独自赶着一辆大马车，整天扬鞭驱车拉运大队部的粮秣和一些弹药、体弱同志的背包，浑身大汗淋漓地跋涉于高山峻岭和泥滑路烂的山道上。同志们到达宿营地住下休息、用饭时，他还在那里铡马草；同志们熟睡一觉醒来时已是半夜了，还见他正提着马灯在给骡马加草料。

黄志昌还讲了行军途中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当大队行军途经湖南怀化榆树湾时，突然遭到国民党军残部的伏击。当时，王启勋是打前站的一员，面对敌情，他马上指挥队伍与敌人展开激战，并追击打退敌人，从而顺利地冲过了弹火飞舞的榆树湾。

云南支队于1950年2月抵达云南。3月初，西南服务团一部到达玉溪，与玉溪地区各县地方干部实现胜利大会师。为了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的根本好转，拯救濒于崩溃的国民经济，并保证入滇部队、干部、城镇居民的粮食供给，中共玉溪地委根据上级指示，决定补征1949年度公粮和税收。在3月6日至12日召开的会师大会上，王启勋被任命为易门县人民政府县长。玉溪会师大会刚结束，王启勋就带着使命任务踏上了易门的土地，和县委书记杨履然、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于炳君组成县委领导班子，肩负起繁重艰巨的工作任务。

征粮剿匪

1950年3月下旬开始，易门县按政策征收1949年度公粮，王启勋和县委主要领导一心扑在征粮征税上。根据全县征粮工作步骤和实际征收进展情况，王启勋深入基层，发动群众，讲政策，解难题，开会推进，层层落实，为全县的征粮工

作日夜操劳奔忙。

王启勋经常告诫同志们，云南进驻解放军四兵团和原地下党、边纵的同志加上卢汉起义留用的人员总计40万人，如果不迅速向地方的大粮户征粮、完不成任务，那共产党人在云南这块新区是站不稳脚跟的。那段时间里，只见他日夜奔波，为全县征粮工作操劳。他一方面会同县委其他领导同志，利用旧历二月二日易门大龙泉赶庙会的机会，直接向全县群众宣传征粮的意义和政策；另一方面，对全县一些在征粮上有阻力的产粮区，亲临第一线去做工作。

有一天，王启勋接到一份诉状，说下江口村朱维祯的死亡是他人所为，又有干部反映下江口村群众对征粮有思想顾虑，地富、大粮户有抗粮迹象。为了把问题搞个水落石出，王启勋决定到下江口村了解情况。经过走访调查，终于查清了朱维祯的死亡原因，给了群众一个交代。后来，他又在村小学教学楼上召开群众会议，向群众宣传征粮的意义和征粮政策。由于与会人员大多加之房腐楼朽，楼板断裂下沉，数十名群众被挤压受伤。王启勋不顾自身安危，立即组织随身警卫人员和村干部奋力抢救受伤群众，安排就绪后立即返回县城，派出四名医生赶往出事地点为伤员包扎医治。这桩事虽已过去70多年了，却在下江口村一直传颂至今。

王启勋对工作严肃认真，对同志也是关怀备至。与王启勋一起到达易门的黄志昌在回忆文章中说，王县长给我的印象太深了，他不仅是一位好县长、好领导，而且是我们的良师益友。他写过这样一件事：一次，我从惠民区调研征粮工作回城，见到王启勋，忙放下背包准备向他汇报工作。他却面带笑容忙把我按在凳子上叫我休息，接着泡上一杯浓茶叫我喝，又端来一盆热水叫我烫烫脚。当时我感到局促不安，有点过意不去。心想，哪有县长替一个普通工作人员泡茶、端洗脚的道理呢！我便说：“启勋同志，你是县长，我是一个小兵，这样太不合适了！”他带着慈祥的笑容说：“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嘛！为人民服务哪有贵贱之分，你和我只不过是分工不同罢了。”又说：“我带你们来易门，第二天就叫你们下乡工作，连易门这座山城的东南西北都没弄清楚。有时间还是到县城二会街、三会街去观光一下吧！”听完这一番暖人心房、深切关怀的话语后，下乡一星期来的疲劳一下子都消失了。晚上回机关，王启勋又让我同他一个床睡觉，上床后他才叫汇报工作，我在枕边，边汇报边就睡着了。

血洒南疆

1950年4月29日，为传达玉溪地委关于通海“四·一八”反革命暴乱的通报和县委关于检查征粮工作的决定，根据县委的分工，早饭后王启勋带着两个护乡团战士奔赴离县城20多公里的高寒山区铜厂（即当时惠民区政府所在地），召集区干部传达学习了地委和县委的指示，检查全县的征粮进度，并组织干部囤粮、挑水、搬柴到区政府内，以防土匪突袭区政府。就在当日深夜（即30日凌晨），刘惠中队配合滇西土匪纵队副司令王月秋匪部一部分，咆哮着蜂拥进了惠民区政府。

其实，当时在县城的副县长吴文海29日下午得知小街、旧县土匪暴乱的消息后，立即送出情报要求惠民区干部战士转移到银河小红岩。然而情报在途中被土匪堵截，未能送达王启勋。而且大家并不知道惠民区基干队长杨开祥已经被匪徒游说，通匪叛变。

面对土匪的冲击，王启勋与区委书记周其锐、区长吴文华等及时组织区干部和基干队分布在政府后院碉堡内，居高临下，严阵以待。当土匪接近区政府时，王启勋从碉堡里发觉有一基干队叛徒跑去开大门，接引土匪。他当即大声疾呼：“不准开大门，谁开大门就打谁死！”当场击中了叛徒。几乎就在同时，内奸杨开祥一边指挥另一叛徒从王启勋身后突然跃上拦腰抱住他，一边指使叛变了的基干队打开区政府大门，接引土匪进来。这时，王启勋又一枪击毙了抱住他的那个叛徒，当场给了叛匪一次沉重打击。涌进区政府的匪众一时吓破了胆，只远远地包围碉堡并呼叫“缴械投降”，并不敢越雷池一步。这时王启勋便隐伏在碉堡内作反击准备。后来，土匪看没有动静了，再次进行反扑，王启勋终因子弹壳亮，被土匪冲上来用木棍、铁棒围殴，遭受重伤，血流满身。可他仍拼命地与土匪抢夺武器，进行搏斗，最后，不幸被内奸杨开祥开枪击中，倒在血泊中，为党、为人民贡献了他年轻的生命，时年39岁。

王启勋牺牲后，由于相隔千里，交通不便，家里人虽想去云南看一下他的安葬地，却一直没有成行。直到2000年，在东营工作的王焕梓（王启勋的小儿子）带着妻子和孩子去了云南易门，在那里，他见到了当年从区政府背出父亲的那位同志和父亲当年的警卫员林山。多年来，林山一直住在陵园里陪着他的老领导。他告诉王焕梓，去铜厂那天他正好请假回了家，等3天后回来才知道老领导已经牺牲。后来，易门建立了烈士陵园，他就主动要求到陵园工作，直到退休后还住在那里。他说，他要陪王启勋一辈子！

离开易门前，王焕梓在父亲的墓旁抓了几把泥土带回了栖霞。2007年母亲去世，他把这几把泥土放在了母亲的骨灰盒上边，也算是让父亲回到了母亲的身边……

文化風景

人的诞生，是人生旅途的起点，也是一个家庭、家族的大喜事。在这重要的时刻，人们用各种方式来纪念和庆祝。在烟台地区，有着独特而丰富的婴儿降生风俗习惯。

婴儿降生，谓之大喜，人们用“添喜”“拾小孩”这样亲切的称呼来迎接新生命的到来，接着一系列的庆祝活动随之展开。在满月、“百岁”生日等重要的日子里，家庭会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亲朋好友会聚在一起，共同分享这份喜悦。

在婴儿诞生的第一天，胶东人还有一个重要的风俗——“挑红”，即在门口挂一块红布，或挂一面小红旗，或在红旗中间缝上一张简易的弓和两支箭加一头蒜。弓与箭都是桃树枝和柏树枝，或挂上自家特制的精美的弓箭，让亲朋四邻都知道，我家生孩子了，家族后继有人，兴旺发达，好接受他们吉祥的祝贺。

不同的县市“挑红”有一些差异，但无论是挂红布、红旗还是自制的弓箭，这些红色的元素都代表着喜庆和祝福。

挂红布和红旗不足为奇，但是挂弓箭却是有些说辞的。旧时有志男儿都是骑马拉弓箭，出将入相、光宗耀祖，因此挂弓箭是一种望子成龙的美好寄托。这种弓箭是由各种枝条、红桃绳、红布、铜钱等扎成的。家里有孕妇，弓箭可以提前制作，但是红布上的字需要等孩子出生后再写。

弓箭的弓是用桃树枝弯曲而成。红桃绳长65公分，绑在弓上作弦，中间的旗杆用长约60公分的柏树枝绑在弓把处，箭头是用蓝色或绿色绸布包着棉花扎成的；旗杆两边的弓臂分别扎上一根竹枝和一根李子树枝，四根枝条都是73公分。再绑上2根葱、2根柏树枝，固定在弓弦上。弓箭的下面串上一条长35公分、宽1.5公分的红布，红布上下的卷轴用芦苇杆串上支撑，红布上面的吊线串着10个铜钱，下面坠着5个铜钱，每个吊线上都串着两个铜钱。

如果生的是男孩，这家人会在院门口的左边挂上弓箭，弓箭下面坠着的红布上写着“状元及第”或“梅花及第”或“桃花及第”或“长命百岁”或“志在四方”等，寄托着全家人对新生儿的希望；如果生的是女孩，就在红布上写一个“双喜”字或“巾帼英雄”，挂在门口的右边。

挂弓箭的目的一是报喜，向村里人和过往路人昭示这家刚刚添丁了，并且知道是生男还是生女；二是挂红旗、弓箭还有辟邪的意思，保护新生儿免受邪祟的侵扰；三是让邻居和村人不要在此搞出大的动静，以免使产妇和婴儿受到惊吓；四是产妇坐月子期间，一般不接待外来生人，外人要回避，尤其是戴孝的人不能进入。

在过去，如果土匪经过这样的人家门口，看见这个标志，就知道这家刚生了孩子，会绕过去，不进去抢劫，一是忌讳，二是对新生命的敬畏。据老人口讲，莱州一带的沿海地区，那些对海的渔民看见谁家挂了弓箭，会趁着人家不注意，把弓箭偷了去，挂在船上，以求平安。

红旗或弓箭挂三天就会收回来，有的地方挂十二天再收回，挂在客房墙上。旧时人们住的是草房，因风吹雨淋，麦秸会烂掉，使房子漏雨，一般两三年就得重新苦一次房顶。生孩子的人家用麦秸苫房子时，会叫瓦匠把弓箭压在房顶上，苫在麦秸下面，期望孩子以后会出人头地，高高在上。

新生儿落地，“挑红”只是习俗之一，接着要请一个德行好的人来“踩生”。那时的人们相信，若人有意或无意间走进分娩不久的人家，以后小孩的脾性就会像这个人，所以找个德高望重的人能给新生儿带来好运。三天后，要给街坊邻居“分三日面条”（俗话说“吃三日汤”，有的地方分吃疙瘩汤），街坊邻居吃了面条要来贺喜，进门就说“吹气哈”，有礼尚往来的人家会来送鸡蛋和童装“看欢喜”。然后到姥姥家“打喜”，姥姥家要求“管待”。十二天后，要吃“十二日面”。满月，家人要为孩子举行“满月礼”，设宴款待前来送礼的宾客。现在有的地方流行为“长过三个隆重的生日，亲戚朋友前来祝贺，一般送童装或“红包”作为贺礼。

还有一项重要的习俗叫“出行”。出行可以是三日后，或“十二日”或“满月”后。避开“月忌”日，挑选一个黄道吉日，父亲或姑姑抱着婴儿出去沿街转一圈，怀里抱着一对面食做的“小岁”和一束桃树枝，桃树枝上用红丝线系上七枚铜钱、七个板栗、七个红枣、五枚染成红色的花生果。桃枝用于驱鬼避邪；七枚铜钱既象征“吉星高照”，又有“人财两旺”之意；花生是长寿果，取“长寿百岁”“五子登科”“儿女双全”的寓意；板栗是多子多福；红枣寓意走红运。桃枝上还要系上花花绿绿的饰物。人们看到它，便知“走姥姥”的来了。

这些庆祝活动和风俗习惯，不仅仅是对新生命的祝福，更是对生命的礼赞，它们体现了人们对家庭的重视和对新生命的热爱。



征稿启事

烟台既是沿海开放城市也是革命老区，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文化丰富。为更好地发掘烟台的文化元素，本报欢迎广大读者提供您所知道的发生在烟台以及与烟台相关的事件、人物、故事等稿件，要求稿件内容真实、准确、严谨，可读性强、故事性强，且有据可循。同时，本报还面向读者征集老照片，听您讲述那些老照片背后的故事。

投稿邮箱：ytrbzk@126.com

烟台地区的添喜风俗

□北芳

文武双全

一个午后，在王焕卿的指引下，我们来到了栖霞市蛇窝泊镇东亦村，这里是王启勋的家。这是一个三面环山的僻静山村，王启勋一家当年居住的三间平房因年久失修，如今几乎夷为平地，只剩下残墙断壁。王焕卿告诉我们：“这三间平房，当年住着十口人，我们姊妹7个，我父母亲，还有我爷爷。我的四个姐姐跟父母亲住东炕，我们弟兄三个跟我爷爷住在西炕。”由于孩子多，又没有劳动力，家里的日子过得非常艰难，吃了上顿没下顿；孩子们赤着脚光着腓，连件像样的衣服也没有。

在村里访问一些年岁稍长些的老人，他们对王启勋没有太多印象，因为他们当年也很少能看到他，王启勋的一些事情他们也是从大人嘴里听说的；王启勋从小身体强壮，十几岁时，每天晚上翻山到村前的东孙家村跟师傅学拳，练就了一身硬功夫，在十里八村都有名，后来参加了革命。王焕卿回忆说：“家里穷，父亲就到东边唐家泊一带的中疍、赵家沟做长工，还去福山打过短工。”

在1992年山东省民政厅编印的《光照千秋——山东革命烈士事迹选》中，我们看到了王启勋烈士传略，详细记载了他的事迹：1941年春，王启勋所在的牙山地区解放了，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任民兵指导员、村党支部书记。后来，他调任鱼台区武委会主任兼任副教导员。担子重了，他更加勤奋地工作，组织全区民兵骨干80余人，组成民兵武工队，配合八路军，狠狠打击日寇和汉奸，多次粉碎了敌人的小股骚扰，受到上级的嘉奖。

这一时期的王启勋依然以扛长工为掩护，秘密从事着党的工作。十多年前，王焕卿已经百岁的老母亲曾对他说：“你父亲整天不见人，有时半宿回来，组织党员开会，天不亮就从北山上走了。”后来，王启勋担任鱼台区委书记，又发展了他的妻子入党，并接替王启勋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他还把自己的大儿子送到部队参了军。在王焕卿的记忆里，父亲的形象有些模糊，毕竟父亲南下时，他才四五岁。但多少年来，他的脑海里总有一个身影在萦绕：高大魁梧、威武严肃、身手矫健，他知道那就是他的父亲。王启勋话不多，对子女要求很严。在王焕卿四五岁的时候，有一天父亲回家，他看到父亲腰里别着匣子枪，羡慕得不得了，很想拿到手里看一看，于是伸手去摸，还没摸到，手就被父亲推到了另一边。

在父亲的影响下，长大成人后的王焕卿也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后来转业到父亲曾经战斗过的唐家泊镇任职。有一次他下乡到一个村子里，一位老人一看到他就说：“你父亲是不是叫王启勋？”得知他就是王启勋的儿子后，老人激动地回忆起他父亲当年的一些往事，并佩服地竖起大拇指说：“你父亲当年在这一片威信可高了！”

1947年，国民党军队大举向解放区进攻，此时，王启勋已经调到县委工作，主要负责下乡发动群众参军支前。第二年5月，他又奉调中共北海地委组织部任机关总支书记。为支援淮海战役和渡江作战，他组织干部、调集物资和民工，做了大量工作。

经过抗日战争、土地改革运动、解放战争的考验，王启勋已由一个带着朴素阶级感情入党的贫农儿子，锤炼成为具有优秀共产党员品质的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

徒步南下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天堑，取得京沪杭战役的胜利后，党中央指令二野在南京组建西南服务团，为进军解放西南准备一批开辟新区的干部队伍。考虑到王启勋身体情况好，又有一身好功夫，组织上把他列入了南下干部名单。当时的西南地区，尚有大量国民党军残部盘踞在那里负隅顽抗。到这样的地方去工作，其凶险程度可想而知。此时的王启勋已经年近40岁，又是独子，家里还有7个没成年的孩子，最小的儿子才两岁。老父亲说：“你是家里的顶梁柱，要是你有个闪失，咱这个家就没法过了！”可任由父亲说破了嘴皮，王启勋还是义无反顾地告别家中妻儿老小，于当年7月南下参加了西南服务团。他要到条件最艰苦的西南

悠悠往事

烟台是现代葡萄酒工业的发祥地，有着亚洲唯一的“国际葡萄·葡萄酒城”称号。烟台葡萄酒滋养着我们的历史，滋养着我们今天的文化生活，滋养着烟台这座美丽的城市，让世界微醺。我是土生土长的龙口市村人，40多年前曾与玫瑰香葡萄以及张裕葡萄酒有着一段铭记心底的记忆、难以忘却的情怀。

一

我的家乡位于风景秀丽的泳汶河西岸。1977年我中学毕业后被安排在西河岸果园务工，成为一名果农。这个果园建于1950年代初期，占地面积200多亩，种植青香蕉、红香蕉、国光苹果以及玫瑰香葡萄等经济作物。

泳汶河两岸是松软的沙土地。优越的海洋气候、丰沛的水源加上特别适合水果生长的北纬37度地理位置，让这里生长的葡萄不仅产量高，而且品质好，所以在计划经济时代，每年都被张裕公司全部收购。

阳春三月，果园呈现出一片美丽的景象，各种果树花竞相开放，红色的花苞和粉色的花瓣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葡萄树是四月初前后生长发芽，这时果农们忙着修剪、肥水管理及病虫害防治；夏季是葡萄树体生长与果实生长成熟的重要时节，其间，葡萄的枝、叶、果迅速生长，修剪、抹芽、疏梢、摘心、疏花、浇水和施肥等工序繁多。经过精心的管理，加上充足的阳光和适宜生长的气候，葡萄从米

难以忘却的情怀

□姚玉安

粒粒径直长到玻璃球状大小，从绿色到紫黑色，慢慢进入了成熟期；秋天是葡萄成熟和收获的季节，放眼望去，一行行枝叶繁茂的葡萄树上挂着一串串玫瑰香葡萄，似红玛瑙一般，晶莹剔透。随便摘上一粒又紫又大的葡萄，剥开薄薄的葡萄皮儿，嫩绿的果肉呈现在眼前。轻轻一咬，甘甜的汁水就涌了出来，有一股玫瑰的清香溢满口腔，随即沁人心脾，甘甜而不腻。

成熟的葡萄具有优质的风味和香气，可以保证葡萄酒的品质和稳定性，让酒液醇厚芳香。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的春风让农村焕发了生机。农民改变了传统的单一种粮模式，大面积种植葡萄等高附加值经济作物，但苦于没有市场。在1982年，邻村有人找我帮忙卖掉即将成熟的几万斤优质葡萄，当时我曾到黄城交通宾馆求助张裕公司驻黄城的收购办工作人员，得到了张裕人的慷慨帮助。试想，在那个信息相对闭塞的年代，如果不能及时将成熟的葡萄出手，果农的损失不堪设想。张裕人慷慨豪爽的优良品质和心系果农的为民情怀，让我从心里感激和敬佩。

二

1981年春节后，我到了一家篷布加工厂担任业务员，负责承揽篷布加工业务。三月的一天，我乘公发车来到烟台大马路56号的张裕酿酒公司，与采购科签订了篷布加工修补合同。这是我的第一个客户，签订的第一份合同。从那时

起，我便与张裕公司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

时任张裕公司采购科副科长的张成德，曾陪同我参观了车间的流水线，并向我讲述了公司的发展历程，让我对张裕葡萄酒产生了浓厚兴趣。张成德副科长向我推荐了一款红葡萄酒，我一下子买了两箱。

1982年春节期间，我邀请几位朋友来家开怀畅饮。打开红葡萄酒倒入杯中，浓郁而诱人的深红色液体光泽艳丽、清澈透明，入口酒体丰满，带有浓郁的果香和花香，一丝丝的酸度、柔和而绵长的口感，轻轻地滑过舌尖，醇厚芳香，令人回味无穷。我们在安静、舒适和轻松的环境中，放松心情，一边聊天，一边尽情地喝着，不知不觉地进入微醺的状态，谈天说地、飘飘欲仙，仿佛瞬间抛开生活中的烦恼，有一种释怀的感觉……

张裕葡萄酒陪伴我走过了40多个春秋。40多年来，无论是独自畅饮、宴请宾客，还是馈赠亲友、酬谢客户，它毋庸置疑是我的第一选择。晶莹剔透、美味飘香的玫瑰香葡萄曾多少次让我垂涎欲滴，流连忘返；醇厚芳香、清新爽口的张裕葡萄酒更是无数次让我微醺，让烟台微醺，让世界微醺……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2023年12月6日上午，已过花甲之年的我，怀着一颗感恩的心，从烟台黄渤海新区来到芝罘区大马路56号，来到了张裕公司旧址——张裕酒文化博物馆。我站在旧址南门外，深情地凝视这座拥有着130多年历史的老牌民族企业旧址办公楼，凝视这个曾经留下我足迹的地方……我怀着万般的不舍离开，这般不舍不仅仅是因为一段魂牵梦绕的记忆，更是诠释了我对张裕人、张裕葡萄酒无法割舍、难以忘却的情怀。